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王文涛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强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为“十五五”时期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一、深刻认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意义

“十四五”时期,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推动对外开放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坚实的战略支撑。贸易强国建设取得积极成效,货物贸易规模连续八年世界第一,服务贸易稳居世界前列,数字贸易快速发展;利用外资结构不断优化,“投资中国”金字招牌持续擦亮;对外投资稳居世界前三,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有序推进;多双边和区域经贸合作成果丰硕。实践充分证明,中国越发展就越开放,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大意义。

(一)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要求我们积极应变求变,用好发展机遇、潜力和优势,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发挥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重要法宝作用,可以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忘初心,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动共同富裕”。对外开放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2024年有进出口实绩的外资企业近70万家,存量外资企业近50万家,外贸外资直接和间接带动就业人口超过2亿,大量优质进口促进了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十五五”时期,对外开放在稳增长、稳就业、惠民生中仍将发挥重要作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把开放的蛋糕做大分好,有助于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

(三)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动作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全球

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过去我们的开放是‘跟跑’,现在我们的开放是要‘领跑’”。近来,个别国家搞关税壁垒、“脱钩断链”,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世界开放指数不断下滑。但总的看,经济全球化的前进方向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既有利于我们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也能以自身开放推动世界共同开放,促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百年变局之下,全球休戚相关,人类命运与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十五五”时期,各国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依然紧密,同时也将面临许多共同挑战。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有利于各国齐心协力应对挑战,开展全球性协作,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

二、准确把握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原则要求

《建议》强调,“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十五五”时期,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重点把握好以下原则要求。

(一)坚持扩大开放与深化改革相结合,推进标准更高的开放。改革越深入,对开放的水平要求就越高;开放水平越高,对改革的促进作用就越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开放水平持续提升,但开放空间仍然不小。要在改革中扩大开放,减少制约要素流动的“边境后”和“边境后”壁垒,把握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机遇,既持续深化要素流动型开放,又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要在开放中深化改革,主动对接、积极吸纳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化外贸、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

(二)坚持自主开放与协定开放相协同,推进引领更强的开放。自主开放水平越高,协定开放能力就越强,两者相辅相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自主开放与协定开放协同发力,先后设立

22个自贸试验区,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给予所有已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与31个自贸伙伴贸易额占我国外贸总额比重增至44%,推动达成《促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协定》等多边协定。要推进自主开放,不断提升开放水平,发挥好各类开放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出台更多单边开放举措。要推进协定开放,同更多经济体商签高标准经贸协定,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我国开放从“跟跑”逐步转向“领跑”。

(三)坚持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相促进,推进联通更好的开放。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近年来,我们着力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把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要以国内大循环牵引国际循环,进一步激发商品消费发展动能,释放服务消费潜力,放大新兴消费带动效应,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增强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吸引力。要以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大循环,越是面临外部围堵打压,越要坚持以开放破围堵,扩大国际“朋友圈”,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在更高水平上相互促进、良性互动。

(四)坚持中国之需与世界之盼相兼顾,推进合作更深的开放。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开放共赢,既发展了自身,又造福了世界。2013—2024年,我国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口累计达31.4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累计达1.9万亿美元,促进了共同发展。进博会越办越好,前八届意向成交额累计超过5800亿美元,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大机遇。要坚持立足中国之需,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要合理回应世界之盼,扩大同各国利益交汇点,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

(五)坚持促进发展与维护安全相统筹,推进保障更足的开放。发展和安全要动态平衡、相得益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不断完善维护经济安全制度体系,防范风险和应对冲击能力明显提升。要以开放增实力强安全,牢记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提升软硬实力,在更高开放水平上动态

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同时,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着力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练就金刚不坏之身。

三、全面落实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主要任务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强党对开放工作的全面领导,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拓展国际循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

(一)积极扩大自主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结合自身发展需要主动扩大开放。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研究推动进一步扩大电信、医疗领域开放试点,有序扩大服务业领域自主开放,深化优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扩大单边开放领域和区域,落实好给予所有已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零关税待遇。加快推进区域和双边贸易投资协定进程,扩大高标准自贸区网络,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进一步织密投资协定网络,通过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落实对非洲建交国零关税举措,灵活务实商签更多双边、小多边贸易投资协定。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优化调整区域布局范围,开展更大力度制度型开放试点,提升创新引领发展能级,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完善国家级经开区政策支撑体系,统筹布局建设科技创新、服务贸易、产业发展等重大开放合作平台。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建设自主可控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推进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变革,全面深入参与世贸组织改革,积极参与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等机制合作,推动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

(二)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促进外贸提质增效,加快建设贸易强国。优化升级货物贸易,拓展中间品贸易、绿色贸易,推进贸易数字化,培育外贸新动能,推动市场多元化和内外贸一体化。积极扩大进口,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培育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推动进出口平衡

发展。大力发展服务贸易,鼓励知识密集型服务、传统优势服务出口,大力发展入境消费,扩大优质服务进口。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提升服务贸易标准化水平。创新发展数字贸易,有序扩大数字领域开放,积极发展数字产品贸易,持续优化数字服务贸易,大力发展数字技术贸易,稳步探索数据贸易。提升贸易促进平台功能,办好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数贸会、消博会、投洽会等展会。支持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推动海外仓、市场采购贸易方式、保税维修和再制造等高质量发展。完善出口管制和安全审查机制,全面提升出口管制科学列管、精准许可、有力执法和妥善应对能力,完善贸易救济制度。

(三)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持续打造“投资中国”品牌,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落实好“准入又准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实施好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办好外资企业圆桌会议,开展“服务保障进外企”专项走访活动,全面落实国民待遇,推进数据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营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生态,推动形成央地联动、区域协同、资源集聚、内外贯通的出海综合服务生态。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网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拓展境外经贸合作区贸易投资平台功能。

(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强化同共建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加强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强化合作规划统筹管理,完善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布局,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贸易、投资、产业、人文务实合作,鼓励投资、建设、运营综合发展,扩大三方和多方市场合作,推进产业互通。拓展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卫生健康、旅游、农业等领域合作新空间,高标准建设“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完善多元化、可持续、风险可控的投融资体系,支持企业开展产地多元化布局,推动合作领域、模式、业态创新。加强海外利益保护,健全涉外法律服务体系,为企业海外投资权益提供更高水平法治保障,维护好发展和安全利益。

(原载于12月8日《人民日报》)

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

王宏晓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作为一项重大文化创新工程,国家文化公园不仅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坚定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举措,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具有深远意义。

国家文化公园具有突出的国家性、文化性与公园性。国家性彰显其顶层设计、国家标识的地位,体现国家意志和文化主权;文化性突出其承载的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文化传承传播的核心场域;公园性则强调其面向社会公众的开放、共享与休闲游憩功能,是实现文化惠民的重要途径。国家文化公园的时代价值与重要作用体现在多个维度:

传承弘扬中华文明的核心载体。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留下了灿若星辰的文化遗产。国家文化公园通过系统性、整体性保护展示诸如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等线性、带状或系列巨型文化遗产,能够有效破解文化遗产碎片化保护、孤立化展示的困境,将散落的文化明珠串联成链,形成规模效应和集群优势,生动呈现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和鲜明特色。

强化民族凝聚和国家认同的精神纽带。国家文化公园所依托的往往是承载着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奋斗精神和家国情怀的标志性文化符号。比如,大运河见证了古代中国的文化交流;长征路线铭刻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想;黄河、长江则哺育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建设国家文化公园,能够强化各族人民对这些核心文化符号的认知与情感共鸣,激发全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国家文化公园通常跨越多个行政区,覆盖广阔地域,其建设过程必然涉及沿线地区的生态保护、环境整治、基础设施提升、产业转型升级以及公共服务配套等。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有助于促

进区域间协作联动,带动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有助于系统挖掘地方文化资源,发展壮大文化旅游、文化创意等特色产业,实现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窗口。国家文化公园以具有重大代表性、突出意义、重要影响和特定主题的文化遗产资源、自然景观以及人文活动为核心,通过系统集成、统筹规划、整体保护、创新利用形成特定公共文化空间,是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魅力的重要平台。辅之以国际化的阐释表达、现代化的传播手段,有助于向世界展示一个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近年来,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顶层设计不断完善,《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等指导性文件的出台,明确了建设目标、任务和路径;管理体制机制日臻成熟,跨部门、跨区域的协调机制逐步建立;重点项目建设扎实推进,长城点段保护修缮、大运河河道治理与生态修复、长征历史步道建设等一批标志性工程相继启动或完成;文化内涵挖掘持续深入,相关研究、史料整理、文艺创作日益活跃。与此同时,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作为一项复杂性极强的系统工程,也面临一些突出问题和挑战。例如,统筹协调机制尚待深化、社会力量参与渠道仍需畅通、长效运营管理机制亟待建立等。“十五五”时期,应聚焦“建好”和“用好”两个关键,多措并举推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迈上新台阶。



制图:朱佳妮(AI辅助生成)

强化顶层设计,健全“全国一盘棋”工作机制。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完善国家层面的统筹协调机制,强化宏观指导、政策支持和督促检查。压实地方党政主体责任,推动沿线省市区市建立更加紧密有效的协同联动机制,在规划对接、政策协同、项目安排、标准统一等方面深化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错位发展。探索建立跨区域的生态补偿、利益分享等机制,提升各地参与建设的积极性。

坚持保护优先,筑牢文化遗产安全底线。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严格落实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建立健全覆盖全区域、全要素的监测预警体系。实施精准保护策略,针对不同文化遗产的类型、价值和现状,采取差异化保护措施。加强基础研究,深入开展资源调查、考古发掘、史料整理和价值阐释工作,深刻揭示国家文化公园承载的中华文化基因与时代精神。推进非物质文

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活态传承传统技艺、民俗风情等。

深化创新驱动、融合发展,提升文化传播与利用效能。推动科技创新,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现代信息技术,提升国家文化公园管理、服务、体验的智能化水平。创新发展阐释方式,打造具有深度文化内涵和强大吸引力的陈列展览、实景演出、研学路线、文创产品,变静态展示为动态参与、单向传播为互动体验。促进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培育文化体验、休闲度假、康养体育等新业态,延伸产业链、价值链,同时坚决防止过度商业化和娱乐化倾向。推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对接,实现综合效益最大化。

拓宽参与渠道,激发全社会文化创造活力。健全社会参与机制,搭建多元化平台,鼓励引导

企业、社会组织、志愿者、当地居民等以各种形式参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管理、服务和监督。特别要重视当地社区和居民的主体作用,保障其知情权、参与权、收益权,让其成为文化保护的受益者和文化传承的践行者。加强智库支持,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智力支撑。完善志愿服务体系,壮大文化保护与宣传力量。

完善保障体系,确保可持续发展。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管理提供法治保障。创新投融资机制,在加大政府投入的同时,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引导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参与。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培养引进规划、保护、管理、运营、研究等各类专业人才。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将保护成效、文化传承、社会效益、群众满意度等作为重要指标,确保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行稳致远。

(原载于12月8日《光明日报》)